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

周文玖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

周文玖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 / 周文玖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9. 12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2110 - 2

I. ①民… II. ①周… III. ①史学 - 文化交流 - 中国、外国 - 民国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278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450016 电话:6578807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73 千字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

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

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

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

郑 林 周文玖

序 言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八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

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除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通古察今”系列丛书。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篇幅虽小，然问题意识明显，学术视野尤为开阔。希冀它的出版，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通古察今”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9年1月

目 录

前 言 \ 1

一、中日史学交流 \ 5

(一) 近世以来之日本史学界 \ 5

(二) 晚清中日史学交流 \ 7

(三) 民国时期中日史学交流 \ 10

二、中美史学交流 \ 29

三、中法史学交流 \ 49

四、中德史学交流 \ 75

五、中英史学交流 \ 101

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

六、中苏(俄)史学交流 \ 127

七、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史学交流 \ 143

八、中外史学交流对民国时期史学发展的影响 \ 154

参考文献 \ 160

前言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民国时期（1912—1949）的中外史学交流。因为民国接续晚清，书中个别地方不免突破上限，对晚清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亦有所涉及。

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从西南、西部到东北，有高原或沙漠环绕，东部和南部是海洋，因而在陆路交通和海上交通均不发达的古代，高原、沙漠和海洋都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天然屏障，妨碍了中国与外国的交流。东汉末年以后，从西边的陆路传来佛教，经魏晋南北朝，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魏晋玄学的产生，与佛教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到唐代，佛教势力大盛，统治者一度提倡之，但主流思想界则对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事物的发展往往如此，对立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相互影响。至宋代，

儒、释、道彼此融会，理学是儒学吸收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产物。明末天主教之东来，可谓中外文化交流达到又一个阶段的标志。天主教带来了西方文化，包括一些科学技术，但那时明朝对天主教能够完全掌控。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外国商人、传教士被限定在一定的区域，西方世界，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对中国影响不大。总之，在鸦片战争以前，周边的国家都比中国落后、弱小，中国对它们来说，是大国、强国、轴心国，具有很大的向心力。它们派遣使者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的科技和文化。中国基本上保持着独立自然发展的文化单元的状态。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是千年变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文化进来了，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此前相对封闭的历史时代了。面对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自身需要应对。不仅在政治上不得不进行变革，而且在文化上，知识界为了挽救时局，也主动地开眼看世界，并意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了。中西方文化进入了碰撞、交流期。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有关外国的史地著作，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第一批成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

柘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猷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这些著作对外国的认知，远比传统正史中的“外夷传”“外国传”翔实得多、准确得多。它们直接运用了外国人提供的材料，有的作者在写作时，甚至与外国传教士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西方传教士也在通商口岸设立书局，于传教的同时，出版刊印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史地方面的书籍。洋务运动兴起后，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都编译了一定数量的西方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书籍。这为中国了解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提供了资料。西史东渐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入民国时代，中外史学交流更加密切，对民国时期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因此，中外史学交流是民国时期史学史研究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21世纪以来，中外史学联动问题受到重视，产生了可喜的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使中国近现代史学显得更立体、更丰满了。

本书在过去成果的基础上，从国别史学交流的视角来考察中外史学交流，以他国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

主。当然中国对他国的史学影响也应在研究范围内(即所谓海外中国学),但由于资料限制和研究工作起步晚,中国史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或中外学术交流史中大都比较薄弱。本书自然也不例外。本书的梳理是纲要式的,意在以国别的形式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和轮廓。“中外史学交流”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资料分散,头绪繁多;对国外汉学家研究成果的研读及评述,还需要外语和多方面专门知识等技能。深化该课题研究,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愿这个小册子,能够为青年学子提供进一步探究的基本知识和学术线索。

一、中日史学交流

(一) 近世以来之日本史学界

明治维新后，日本仿照西方，创办高等学校，建立研究机构，成立学会，编辑学术刊物，学术研究迅速实现了近代转型。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历史学方面亦取得快速的进步。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创设史学科，聘请德国人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为教授。利斯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再传弟子，至此，西洋近代之史学研究法传到日本。当时日本史学界以日本史、中国史、西洋史鼎足而三。日本人以西方体例著中国史，取得初步成绩，著名的史书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甲午战

起，日本学者注意范围渐大，在那珂通世倡议下，中等教育设立东洋史科，以与西洋史对立。其间著作有宫本贯之《东洋历史》、藤田丰八《中等教育东洋史》、市村瓚次郎《东洋史要》、桑原鹭藏《中等东洋史》等。东洋史成为与西洋史相对应的专门学问。所谓“东洋史”，就是以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内容，范围兼及四周国家的治乱兴衰及其相互关系。

日本各大学，实乃日本研究各种学术的最高中枢。学校内设立各种学会，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协作，对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大作用。东京帝国大学内有史学会、东洋史谈话会、支那哲文学学生会、汉学会、东洋史同好会、东京历史研究会。京都帝国大学内有史学研究会、京都文学会、支那学会、支那学社、东洋史谈话会、东洋史研究会。京城帝国大学内有支那哲文学会、青丘学会。东京文理科大学内有大塚史学会、汉文学会。早稻田大学内有东洋学会、支那哲学部会、东洋史学会。庆应义塾大学内有三田史学会。这些学会有的还办有学术刊物，如东京帝大史学会的《史学杂志》、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会的《东洋史研究》、支那学会的《支那学》等，都是影响很大

的学术期刊。

除了大学史学科及其史学会，有一些学术资助机构和图书馆，在历史研究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帝国学士院，设立基金，奖励论文著书成绩卓著者，对于有深造希望之士，给予研究学术补助费。此外还有亚细亚学会、东洋协会、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日本著名的图书馆有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日本的历史著述、大学、史学团体、图书馆，在中日史学交流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晚清中日史学交流

由于历史上中日文化的紧密联系，以及地理的相邻，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频繁。中国通过日本，了解和学习西方史学。中国学习日本主要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开始的。此间，中国大量地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生在中日史学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从1896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年间，留日生约5万多人。从

1896年到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生的数量呈现抛物线形态，1896年仅有13人，1903年猛增至1000多人，1906年更达12,000人，1907年后开始下降^[1]。此外，旅居日本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从事学术活动，与日本学术界有学术交往，向国内介绍日本史学界的成果。

辛亥革命前，留日生在日本成立了许多翻译团体，著名的有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会文学社、新译界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国学社等。这些翻译团体编译书籍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外交、军事、地理、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实业等等。其中有学术著作，也有教科书。历史书在留日生的译著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900至1911年留日生编译的史地书籍有220多种，绝大多数为欧美、日本新出版的世界史、国别史、外交史、战争史、地区史、史学理论、历史教学法。这期间，日本运用章节体等西方体例所写的中国史、东洋史被翻译至国

[1]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见氏著《中国留学史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248—253页。

内，日本根据西方史学理论编著的史学理论著作包括历史研究法著作被译介过来，被日本引进的西方文明史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兰克史学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有日本的因素^[1]。在翻译日本书籍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用章节体撰写了中国历史^[2]，撰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著作^[3]，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学科框架。清末的“癸卯学制”，其章程主要是借鉴的日本的学制。因此，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学产生的阶段，被称作“早期新史学”。这个阶段，中国史学受日本的影响最大。早期新史学为民国时期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 [1] 据考，国人中最早在文字里提到兰克的是王国维。他在1900年为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著《欧罗巴通史》所作的《序》中说：“日本理学士箕作元八及峰山米造两君所著《西洋史纲》，盖模德人兰克 Ranke 氏之作，以供中学教科之用者。”
- [2] 如曾鲲化著的《中国历史》（1903年出版上卷，1904年出版中卷），涉园主人（张元济）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庆年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版），夏曾佑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1905年、1906年分三册出版），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年版），吕瑞庭、赵激璧编的《新体中国历史》（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徐念慈编的《中国历史讲义》（1908年版）等。
- [3] 如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曹佐熙的《史学通论》等。